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3.5

5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政变后40年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社会学志业

Elizabeth Jelin,
Immanuel Wallerstein

全球社会运动

巴西 – Ruy Braga and
Ricardo Antunes
埃及 – Asef Bayat and
Mohammed Bamyeh
土耳其 – Polat Alpman,
Zeynep Baykal and Nezihe Ergin

不平等

Guy Standing,
Juliana Franzoni,
Diego Sánchez-Ancochea

- > 中国在非洲
- > 讨海人志
- > 屠杀之岛？
- > 全球南方内部对话的阻碍
- > 阿尔巴尼亚社会学
- > 动荡时代的社会学
- > 日本会前会
- > 哥伦比亚团队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5期 / 2013/11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编的话

南方内部的对话

走 遍南美洲一定会感觉到其多元性。这期的 Juliana Franzoni 和 Diego Sánchez-Ancochea 记载了这块大陆对不平等的抵抗。然而，这里也有差异。智利和乌拉圭分别就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光谱的两端。当其面对社会议题时，前者仍处于黑暗时代，后者则在毒品、同志、堕胎等议题上相当进步。乌拉圭因为铲除了原住民，所以其人口要比秘鲁要来的同质。但在乌拉圭 Tupamaros 已经进入了左翼政党联盟，而在秘鲁和哥伦比亚则是游击战仍活跃。的确，哥伦比亚是个矛盾冲突之国，民主加上暴力。所以由一群杰出律师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 Dejusticia 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去保卫其原住民和其他社群免于暴力的恐惧。

南美虽然有许多差异，不过其社会科学家已经建立了跨国的合作模式。因此，智利社会学家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在独裁时代和其他国家合作的努力有其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个南方合作不仅仅是想要建立社会学而已，在重重困难下他们办到了。如何困难呢？Eliana Kaimowitz 描述了 Dejusticia 筹办一个给全球南方年轻人权分子的工作坊为例，说明首先要到进入哥伦比亚是多么困难。主要方式是从北美转机，可是要取得过境签证很不容易，接着要取得哥伦比亚签证也不简单。相较之下，我从北美到哥伦比亚甚至不需要签证。再者，这个会议只能从福特基金会那里筹到款项，这和北方学者要申请经费研究南方议题的处境很像，像是 Ching Kwan Lee 研究中国在非洲的角色，Helen Sampson 研究海人的跨国工作经验，或是 Guy Standing 的印度基本现金补助等，北方的大学成为了南方研究人才的磁铁。

最后，我们两位社会学志业的作者：Elizabeth Jelin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已经投入南方内部和北方与南方之间对话的努力很久了。北方社会学家有其差异，有些对于全球不平等更敏锐，当然南方学者也同质，少数学者可以跨出国界，但是多数还是在国内研究。若全球不平等限制了南方内部的对话，其他资源，不仅是社会媒体，则在链接社会运动上变得相当重要。这期我们看到了巴西、埃及、土耳其的社会运动，而全球对话正是连结他们的平台！

全球对话以 15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是拉美重要的社会学家，描述独裁统治下的知识实践和错误的政策后果。



Elizabeth Jelin 是杰出的阿根廷社会学家，描述如何连结全球不平等和在地的学术实践，关怀正义与平等议题。



Immanuel Wallerstein 是 ISA 前会长 (1994-98)，首位得到 ISA 杰出学术与实践贡献奖的人。其描述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学科思考的限制。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行主: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执行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副主编: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Celia Arribas.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Hamidreza Rafatnejad, Tara Asgari Laleh,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Faezeh Khajezadeh

日本:

西原和久、芝真里、姬野宏輔、高見具広、岩館豊、池田和弘、福田雄、三部倫子、堀田裕子、小坂有資、前田豊、仲修平、加瀬希和子、大森美佐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Kinga Jakieła, Julia Legat, Kamil Lipiński,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Monica Alexandru,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Monica Nădrag, Cătălina Petre, Mădălin Rapan, Lucian Rotariu, Alina Stan, Mara Stan, Balazs Telegdy,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Eleonora Burtse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Julia Martinavichene, Ekaterina Moskale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乌克兰: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Anastasia Denisenko, Marii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tsova,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Myroslava Romanchu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南方内部对话 2

政变后40年

访谈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智利 4

社会学作为志业 - 反对一切不平等

by Elizabeth Jelin, 阿根廷 8

社会学作为志业 - 历史社会科学家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美国 10

> 全球社会运动

巴西

6月革命

by Ruy Braga and Ricardo Antunes, 巴西 12

埃及

革命的限制

by Asef Bayat, 美国 14

街头对抗国家

y Mohammed Bamyeh, 美国 17

土耳其

从受辱到抗争

by Polat Alpman, 土耳其 19

反抗的艺术

by Zeynep Baykal and Nezihe Başak Ergin, 土耳其 21

> 不平等

印度空前实验

by Guy Standing, 英国 24

拉美不平等的下降

by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Costa Rica and Diego Sánchez-Ancochea, 英国 27

> 田野笔记

中国在非洲

by Ching Kwan Lee, 赞比亚 29

持续的浪潮

by Helen Sampson, 英国 31

波多黎各: 屠杀之岛?

by Jorge L. Giovannetti, 波多黎各 33

> 各国的社会学

南方内部对话的阻碍

by Eliana Kaimowitz, 哥伦比亚 35

阿尔巴尼亚社会学

by Lekë Sokoli, 阿尔巴尼亚 37

动荡时代的社会学

by Ayse Idil Aybars, 土耳其 39

社会学先进与年轻学者聚首于横滨

by Mari Shiba, Kyoko Tominaga, Keisuke Mori和Norie Fukui, 日本 41

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团队

by María José Rivadulla, Sebastián Santamaría, Andrés Araújo和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哥伦比亚 43



> 智利政变后的 40年

访谈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Part I: 独裁下的社会学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Manuel Antonio 是拉丁美洲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从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毕业，并于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 Sociales** 拿到博士学位。他也是许多学术机构的执行者，在国内外许多的大学里教过书，同时也是许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的顾问。他研究过的主题不计其数，著作汗牛充栋，涵盖了威权政府、社会运动、政治转型、社会科学知识境况等领域。现在他担任 University of Chile 的社会学教授。之前是英国 Cambridge University 的拉美研究 Simón Bolívar Chair，也是 ISA 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委员会会长 (RC47)(1998-2000)。2007 年他荣获了 Chile's National Priz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本访谈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27 日于 Santiago。

布：过去 50 年来你历经了世界史的起伏，早期是 Santiago 的 Catholic University 的学生会会长，而 1967 年到了 Paris 于 Alain Touraine 的门下作研究，并且历经了 1968 年的运动。而 1970 年你回到智利研究让 Salvador Allende 取得政权的运动。我对你在从政变至今的 40 年来的历史感到兴趣，所以，1973 年

>>

你在作什么？

MAG: 从法国回到智利后，我成为社会科学学科际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是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 Catholic University 底下，有许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政变发生时，我被驱逐出校园了，中心也被迫关闭。那时我 30 岁，有两个选择：流亡，或是留下。我因为介入校园政治颇深，所以和国家政治也有牵扯，所以我选择留下。

布：但你怎么在独裁统治下当一个批判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的？

MAG: 军队接管了校园，并驱逐了有左派色彩的人。这些人在其他学校是多数，但是在 Catholic University 并不多。为数虽少，但是其实影响力很大。留下来的人多半都找组织或机构当作保护伞。其他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也是一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CEBRAP，是一个位于 São Paulo 的中心，由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和其同事所建立。

我们不能建立任何新的事物，所以就栖身在 FLACSO (Latin Americ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之下。这个组织在政变以前是政治与社会学的研究所，由一些其他的组织，像是 Ford Foundation、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瑞典的组织、或是英国政府在 Harold Wilson 领导下的组织等所支持运作着。而当军队接管后，切断了这些国际组织的支持。我们就在由 Cardinal Raúl Silva Henríquez 创立的基督研究院 (Church and the Academia de Humanismo Cristiano) 所保护着，因为这个组织在政变后成为一所大学。但在 1980 年代，其他的机构成立了，像是公司或是咨询机构等等，这些就成为支持我们中心的来源。

布：你在 FLACSO 之下可以作些什么？

MAG: 你一定知道智利曾经是拉美国际组织的大本营。所以政变之后，学生没了，FLASCO 成了蚊子机构。不过留下来的人或新来的人，像我这样，都致力于研究。一开始人们非正式地讨论研究，这很有趣，有些老师也把学生都送过来。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学校教了很多课，虽

然都不算学分就是了。前来的人都想知道这个国家和其他拉美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就讨论这些。所以这像是个非正式、开放、又反体制的学校。不过教学只是一小部份的工作。我们主要还是作研究。举办研讨会、辩论、出国、邀请学者等等，这像是在威权脉络下的公共社会学！

布：你如何在独裁政府下享有这些自由的？

MAG: 你必须了解到军队试图掌控一切。在 FLASCO 就有政府指派的将军安插在学校理事会之中。这个将军甚至后来成为了 University of Chile 的联络人。虽然他们也想掌控教会等组织，不过方式不一样。他们想要切断我们和社会运动的联系，甚至在一开始的两到三年间还审查我们的刊物。后来一旦他们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后，就需要市场调查，所以问卷调查被允许了。虽然他们想控制问卷题目，不过方式非常粗糙。

布：收集资料会遇到阻碍吗？

MAG: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独裁者假造数据到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地步，所以我们当然需要自己的数据。例如，经济机构 CEPLAN，由 Alejandro Foxley 所负责，其后来成为民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都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平行解释。其他机构也必须有自己的价格标准，因为政府的数据都造假。

布：数据是这样，那理论呢？以及你当时怎么看待独裁者及其未来？

MAG: 60 年代的拉丁美洲有一波社会科学的新潮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席卷了各校园，取代了现代化理论。但是独裁者也来得很新，所以我们得找其他的框架来解释这个现象。我得说，那个时候，葛兰西的观点很有用，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可以从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走出来。而且这对于政治学来说是个契机，因为那时之前社会学一直是唯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对于研究政体并不在行。更精确来说，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政体的社会脉络，像是支持者或是反对

>>

者，但是对于政体本身的运作并无法掌握。所以社会学家变成了政治学家，我们称之为“*políticos*”。

布：照你这样描述，你似乎有很大的自由度。我想你也研究政体吧？

MAG：噢，其实我们研究的不只这些而已，也出版了很多其他主题的文章。在1980年代FLACSO开始了一系列的书籍计划，包括我的*El proceso político chileno*。我给你的是英文翻译，*The Chilean Political Process*。我们也有自己的期刊，虽然有些被禁了就是。总之这个政体，以Juan Linz的分类来说，是个威权政府，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政府有办法控制私人领域。当然，有些人被掌控得很彻底，不过这个政府并无法控制知识分子，只要知识分子不要过于张扬就好。像是我们虽然不能上电视，可是我们可以在电台上讲自己的研究。我们在期刊上也有专栏，并且提供知识背景给反对阵营，因为我们的研究更贴近人民真实生活。我们也展现其他国家的经验，像是西班牙，说明反对是有可能的。我们也成为学运组织的顾问。

布：你在政变初期就提供批判分析了吗？

MAG：是的，后来也是。例如，政变几个月后，我秘密组织了Russell Tribunal报告，由我和我其他被驱逐的同事写成。这是国际谴责拉美侵害人权情况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智利的情况，因为Allende政府的推翻获得了很大的瞩目，国际相当关心。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我们可是用纸本传递我们的报告！

这个政权之下还是有些自由的空间，有些时候是被教堂所保护，有些是被国际组织，有些则不需要保护因为军队不在意。我想，也由于基督教民主党后来支持反对阵营，保护左派知识分子，所以若你要镇压知识分子，等于是要跟基督教民主党对抗，那个是50-70%的人口哪！

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独裁统治下的命运为何？

MAG：我们都很积极参与所谓的“社会

主义革新”运动 (socialist renovation)，也就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一种欧洲共产主义的形式。以智利的70到73年的经验来说，我们问：什么是Allende的计划。那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并不转变资本主义。在那个意义之下，那时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人士，可是个污辱啊。那是一个想要开创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尝试，毕竟政府中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想要转型到社会主义。

布：所以Allende政权的推翻意味着？

MAG：拉美左派的特殊性就在此很重要了。这里你看到列宁主义政党用军队的修辞看待整建事情。当然，没有错，左派被军队推翻了，可是社会主义计划也失败了啊，Allende和Unidad Popular政党所做的事情都失败了。他们想干两件事情：维持民主和打造社会主义，可是怎么作？用列宁主义！这当然会失败，因为这预设了双重权力，而且人民权力部份已经在Allende的国家手中了。

布：啊，我了解了，你说的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一点也不合？

MAG：是，列宁主义不适合，不过却可以吓坏了中产阶级。第二，若要发动革命，是一场迅速且轰轰烈烈的变化，不论在社会经济或是政治上都是如此。要这个作，就要有革命的方法，有个群体掌握权力，接管国家，打造新的制度和社会秩序，并定带来暴力和武力。

布：好，那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计划呢？怎么取代暴力和武力？

MAG：社会政治多数。若你有政治上的多数，你就赢了。你孤立那些你反对的力量，那些想要消灭社会制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然后建造一个绝对不同的政治多数群体。像是若是在阿根廷，那就是要掌握Peronist party，只要你有办法掌握Peronist party，你就有了所谓的政治多数。

智利的历史上，因为在1930年后有了新的社会，所以政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以学生运动为例，其

就是各个政党候选人的摇篮。学运政治就像是政党的青年部，所以学运和政治很难切开。更广泛来说，你没有严格的社会阶级，因为都整合到政党里面去了。

布：那你后来怎么打造政治多数的？

MAG：怎么打造？联合政党。那又怎么联合在一个分裂为三个政党的势利？右派包括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然后在 60 年代的民族党。中间派在 30 到 40 年之间，是由激进党所代表，后来被基督教民主党所取代。左派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到了 60 年代变成了中间政党所分出去的小党所，取代。所以只要左派没有办法取得多数，那就要联合中间派。在 73 年的国会选举，Allende 得到 44% 的票，但在民主国家这不是多数。

布：但联合中间派意味着妥协？

MAG：没错！这是个问题，但是你想 Gramsci 会怎么说？妥协为了说服联盟的人，可是这么作没有动用暴力和武力。这是政治，所以想要在民主的架构下有翻改革，然后深化民主，你就必须先取

得政治多数。选举多数还不够，因为选票多数不代表社会政治多数。在 1974 年的 Berlinguer 一场演讲中（意大利共产党的国家秘书长，1972-1984）这么说：“我们会赢得选举，可是若是基督教民主党没有和我们合作，是无法掌权的。”所以为了执政，必须孤立保守党、反动势力、和军队。

所以总地来说，在政变之后我们主要致力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革新”上，也就是开创新的理论框架去处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包括了讨论你所提出的那些争议点，但主要都是在于合理化联合政党以去打独裁。但是到了 1980 年之后，共产党就反对这个策略了。

布：下次我们会讨论怎么实现这个政治多数的策略打败独裁，然后相关的限制。谢谢你，Manuel Antonio，你告诉我们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

> 反对任何的不平等

by Elizabeth Jelin, IDES (Institut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阿根廷, ISA 执行委, 1986-1990

Elizabeth Jelin 是阿根廷知名的社会学者，其研究领域包括人权、政治压迫的记忆、公民身份、社会运动、性别、以及家庭。著作包括了 *Los trabajos de la memoria* (2002, with new edition in 2012)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State Repressions and the Labors of Memory*), *Fotografía e identidad* (2010) (*Photography and Identity*),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1990). 她在许多所大学担任过客作教授，也担任许多学术机构的咨询顾问，包括了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ILO 劳动研究、以及 ISA。现在她是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as well a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CONICET (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y Técnicas of Argentina) 的学术顾问，也是 IDES (Institut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位于 Buenos Aires) 的顾问，同时也是 UNG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的社会科学系教授。2013 年她荣获了阿根廷最高奖项：Bernardo Houssay National Prize，表扬在社会科学得生涯杰出贡献。



Elizabeth Jelin.

在 我决定以学术作为志业的时候，我才 16 岁。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的现代花朵正在绽放之中，而我选择新的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社会系。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未知且谜样的转变。我身边的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社会学。但是社会学很快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至今仍是如此。历史的机遇也很特别，因为在那时候，对于教育私有化的辩论与争议正在激烈进行着，大街小巷中的人的热烈谈论这个主题。我加入了免费、公共教育的队伍。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私人生活、学术兴趣、公共参与紧密交织成了我的生命全部，不可分割，我也无意分割。

在 Buenos Aires 我作为一位研究学徒，后来在墨西哥的教学，最后到美国读博士。我于 1968 年 5 月到了纽约的市立大学，那时正直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抗议活动，我顶着怀孕的大肚子参加

了！那个经验，以及其他的女性主义运动，成为了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会不平等以及争取社会平等正义的运动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特别的议题或许有变动，因为时代在变迁，像是 1970 年代的核心是拉丁美洲城市的移民、在公部门的女性、劳动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劳工运动等等。在 1980 年代则是新社会运动，像是公民身份、转型时期的人权，以及最近的像是政治暴力与压迫的记忆，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运动。

我关心人群，焦点从个人日常生活的实做到集体与公共的参与活动。所以我也关心家庭和照顾的议题。同时我也研究行动的意义和感受，以及行动的制度与结构框架。除了文字表达之外，我结合视觉影像和社会学实践。其中一个是从各个时间性的立场去研究历史过程。为了结合历史和传记，我认为，变动的步调和韵律，机遇和长时间历史是我们理解社会的关键所在。

我也充满了热情去看人们如何发展出反身性的热情，敞开心胸去接受新的知识与思想。没有什么比别人在看到我的作品之后跟我说“这让我好好想想”还要令我开心的事了。这包括了看着学生如何变成研究者的过程。数十年下来，我为了培育下一代研究人才费尽思量，作过很多努力。研究好奇心和生命经验是最核心的基石。之后才有发现、学习、形成研究问题、文献回顾、然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之中没有公式可言。若没有前人的经验，研究的想象很难塑造

出来。所以要打破个人主义和孤军奋战，促进对话与合作，这是我惯用的方式。我利用这个方式在“压迫的记忆”研究小组中去训练年轻研究者，和从 6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者合作。这也是我在社会科学博士班的责任之一（由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和 Institut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in Buenos Aires 一起合办）。

我也爱好旅行。我在包括南美、北美、欧洲等地方待过，并且教学和研究。我定居在 Buenos Aires，这是个国际城市。而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让这个由西方所主宰的知识社群看见这个边陲城市如何可能对于知识有所贡献。为了对抗地理限制，挑战在于发展真正的国际主义世界观。事实上，国际主义知识是在边陲里发展出来的，因为边陲需要知道核心国家正在干些什么，而且要把那些“核心知识”和自己关联起来。而核心的学者则总是把自己所在地生产出来的知识看成是普世标准。长期下来，这个制度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包括生产出一些不重要、不相关的知识，对于这个学科发展并无益处，更不用说促进平等了。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翻转这个不平等！■

> 历史社会科学家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Yale University, 美国, 前ISA会长(1994-1998)



Immanuel Wallerstein.

Immanuel Wallerstein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与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起始于1960年代对于非洲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研究。后来他转向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1970年代其对于世界体系的研究取径重新点燃了社会学对于比较历史的热情，也开启了像是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研究领域的视野。Wallerstein也和其他学科的学者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意义。他足迹遍布世界，担任过ISA的会长。任职期间致力于让全球南方的学者加入。他毕生的贡献也被ISA认可，获得Award for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其实我不太确定社会学是不是我的志业。当我是大学生时，我逛遍了各个社会学科学系所。而我决定要念社会学研究所时，我只是觉得社会学作为一个组织或许要比起其他学科来得更少规训和限制。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于1950年代进入Columbia University的社会系，那时该系定位自身为世界社会学的中心。但其实我显得格格不入。我并不和Merton或是Lazarsfeld写论文。我的兴趣是在非洲，是该系的唯一一人有这个兴趣。Paul Lazarsfeld曾经告诉我，我是唯一一个没听过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这有点太夸大没错，但是这预言了我的方向。很幸运地，这些教授并没有因为对我的兴趣的不解而把我排除在外，反之相当容忍我。

>>

我在 1958 年开始于 Columbia 教书。1963 年，该校有了第一批曾经参加过 Peace Corps 的研究生，这意味着这些人到过第三世界，而且有着美国以外的兴趣。我教的课（和 Terry Hopkins 合开）非常受到这些学生的欢迎（包括外系社会科学的学生）。

后来 1968 年校园暴动，社会学学生总是在前线，年轻教师也加入。这个 68 年的世界革命不仅改变了参与者的政治观，也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我曾经为这个现象写了篇文章：“The Culture of Sociology in Disarray: The Impact of 1968 on US Sociologists”（注 1）。1970 到 71 年之间我写了“世界体系”的第一卷。到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学家”不太适合我。我自认是“历史社会科学家”。

自我定位的议题是个越来越要紧的问题，并且以两个方式在两个面向上呈现。第一是别人如何看待我，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学者。在欧洲，特别在法国（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学者通常把我看作是历史学家，或是经济史学家，甚至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

在美国就比较复杂了。向其他社会学家一样，我会申请研究经费。我总会遇到奇怪的问题，特别是我跟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申请经费，得到的审查意见都很极端，不是很赞赏，就是很批评。我认为这个对于什么是好的科学所产生的认识论分歧。所以后来我开始研究“知识的结构”。

这个研究让我们更清楚学科（及其志业）的内部分野，包括历史、有效性、未来。我相信各个学科包括了三个不同的东西。（1）学科都是对于主性的宣称，包括了有清楚的界线，去界定何谓属于或不属于这个学科；（2）学科都是组织结构，其边界是栅栏，去保障其自身的权益，并在大学内、期刊、甚至国家、国际的组织上划定界线；（3）学科是共同文献、风格、学者的集体文化，组织会施加压力给组织内的个体，要尊崇这个文化。

在 Gulbenkian Commission 报告中（注 2），我指出了这个学科的三种意义对于观照从 1980 到 1950 这段期间的经验相当吻合，但是在那之后就有所断裂。这个时代学科的分际相当有争议，不同学科所从事的研究也高度重叠，所以结果就是有股声音要求科际整合。

同时，学科的边界却更加巩固，并且对于跨界相当反抗。不同学科的文化演变得很慢，看看不同学科期刊的脚注就可窥知一二。

最后，我想有件事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我这个我称之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关。我相信这个体系正处于结构的危机，这让我们得必须谨慎思考这个危机的后果。我认为这个危机的起始点在 1968 年，并且预测 20 到 40 年之

间危机不会解除。所以我已经写了许多关于这个结构性危机的文章，包括可能的后果、道德、政治的选择等等。

所以，若要问我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会说我的研究涉及三个不同的领域。第一，我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过程。第二，我研究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第三，我研究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结构是危机的一部分，但需要更细致的解释。

我的研究三部曲就是我的志业。对这个志业下个最短的标签，就是我是个历史社会科学家。还有，我必须强调的是，我有社会学博士学位，且都在社会学系任职，并且担任过 ISA 的会长，我不觉得有必要低估这些组织，因为没有其他比这些更好的了。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对我的立场最为容忍。■

注释

1. Craig Calhoun, ed. (2007).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427-437.
2. Immanuel Wallerstein (coordinator).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巴西的六月革命

by Ruy Braga,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RC44 (劳工运动)委员 • Ricardo Antunes,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巴西



巴西的6月抗争标志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

2013年6月是巴西社运史上重要的一个月。6月6日开始，São Paulo 有场游行吸引了2000人参与。这是一场抗议公共运输费用的游行，而该运动 Movimento Passe Livre (Free Fare Movement, MPL) 的年轻人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撼动了整个国家。可与比拟的运动是在独裁时代1984年的那场争取直选的运动。

的确，在6月19-23日之间，根据巴西民意统计所 (IBOPE) 的调查，大概400个城市，包括22个州的首都，共约6%的

巴西人口走上了街头抗议。原因有三。第一，这是现存发展模式的必然后果。现今对于低廉劳动力的剥削，不平等的所得分配等等是主因。第二，这是全球经济危机深化的警讯，也是巴西政府经济增长停滞的后果。第三，对于GDP成长的反对(2005-2010)，扩大成为全国抗争。

Lula 总统的第一任期时，经济政策广受瞩目，可是以贪污丑闻收场。所以接下来为了收拾残局，变扩大社会支出，提高最低工资，然后巩固大众支持。政治学家 André

Singer 指出，这个策略帮助巩固了 Lula 在贫穷地区的支持度和声望。

再者，公债的管理和恢复劳工阶级的支持，政府开始正规化劳动市场。这个过程给了劳工有更大的社会保障。经济成长的加速是由于过去10年来商品价格的提高，使得社会支出提高和劳动保障的扩张得以并存。

可是，这个霸权慢慢出现了一股隐藏的潮流。毕竟，除了正规化、劳动市场、最低工资之外，这个发展模式也出现了许多任务殒意外，受雇者的汰换频仍、劳动力外移、弹

性工时、以及对于公共交通、健康、教育投资的大幅降低等问题。

这个模式的另外一面导致了劳工阶级的抗争，特别是年轻的工人，无照、无工会、半技术、无支薪等族群。我们不该忘记过去10年间，94%的工作只给付了少于最低工资1.5倍的薪水(USD450)。

65%正式工作者是年轻人，介于18和28岁之间。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到为什么年轻人会在六月走上街头去抗议了。根据一项“Plus Marketing”的研究，6月20日在Rio de Janeiro的抗议人群中，多数是失业者(70%)，而领取低于最低工资的人占了34%。若我们加上那些领取最低工资3倍的人(30%)，则超过64%的百万抗议人口是属于都市无产阶级。

此外，罢工的人数也在2008年后急速增加。根据经济研究和统计部(DIEESE)的研究，在2010年后因为罢工增加，2010年的关厂时间也比

2011年增加了75%，这只比1989和1990年低而已。经济成长停滞和劳动人口过剩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事实上，各种运街头运动的形式和以往的经验大不相同了。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抗议者的改变。在这次抗议的初期，多半是使用大众交通运输的学生和劳工。而2005年后，抗议扩散到其他城市，像是Florianópolis, Porto Alegre, Vitória, Salvador等，也和左派政党有所连结。而且在São Paulo警察的暴力镇压后(6月13日)，抗议扩大了，扩大到郊区，年轻人开始封街抗议。结果这些少年郎和青年劳工吸引了传统的左翼劳工阶级。6月11日，约3百万人发动总罢工，占领了城市，瘫痪了交通。

最重要的是，这些抗议和罢工打破了巴西的神话：巴西是个中产阶级布尔乔亚国家，即将迈向全球第5大经济体，人人安居乐业，爱国爱己，努力发展经济。现在的社运反应了巴西人其实对愈这个

发展模式的不认同，且抗议将持续下去。

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扩大私有化，包括港口、机场、道路，以及大众对于健康、教育、交通等权利的诉求。或许这就像1948年六月革命的口号一样：

“笨蛋，问题不在钱，而是权利！” ■

> 革命的局限

by Asef Baya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美国



| Morsi总统面对军队。

埃及前总统 Mubarak 在 2013 年 8 月 22 日被释放，这是个转折点，这代表了从 2011 年 2 月 11 日 Mubarak 下台的那一刻，反革命的势力在 2013 年 7 月 3 日到达了顶点，因为 Sisi 将

军把穆斯林兄弟会的民选总统 Morsi 革职。军队冻结了宪法，并且组成临时政府，选出新的总统、国会、宪法。在一次的暴力镇压中，大约有 1000 人死亡，包括了 100 名警察，军队开始肃清兄弟会。当兄弟

>>

会节节败退之时，Mubarak 党人开始欢呼，上媒体、上街头去攻击对方。沙文主义、错误讯息等充斥这些想要回到以前政府时代的言论。旧的党人，包括安全局人士，特务头子、巨贾、媒体大亨等从中获利许多。监视行动从兄弟会扩大到任何其他可疑的人，包括左派、自由派、革命派。即使前副总统 Mohamed El-Baradei 也不可幸免。那些革命人士眼睁睁看着反革命上演着。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若革命是个大变动，则反革命处处伺机而动。可是反革命很少成功，因为他们缺乏了群众基础。路易坡拿巴的雾月十八事件很短命，法国大革命证明了这点。1848 年欧洲革命则是克服了反革命的挑战，成为了新的民主模式。在 20 世纪，所有在苏联、中国、古巴、伊朗的反革命都失败了。在菲律宾，军队的连续政变反对在反 Marcos 的人民力量后兴起 Aquino 政府，也都保持中立。只有在尼加拉瓜于 1979 年后的反革命成

功了，透过了选举的方式成功。美国支持的势力则削弱了 Sandinista 党人的革命力量，因此确保了右翼 Violeta Chamorro 在 1990 年的选举胜利。

不过在埃及所发生的事件也不完全代表了反革命的胜利。我在别处提到（注 1），埃及、突尼西亚、也门等其实历经的都不是真正的革命；相反地，他们所经历的是“refo-lution”，也就是改革是透过执政者开始的。这个吊轨的迹象可以看到的是革命党人受到民众支持，可是却没有执政权力。革命有霸权，可是没有实质权力。所以结果就是革命必须依附执政权力才得以开展。当然，要期待执政者可以改革自己是天真的想法。即使有，执政者也会伺机反扑。革命人士很快意识到自身的跛脚命运，但是除了上街抗议却没别无他法。

所以，当非伊斯兰的革命派快速被边缘化后，组织完整的兄弟会马上站上锋头，即使只有不太多的多数，也可以执政。可是兄弟会没有满足革命的要求：“面包、

自由、正义”，反而只为了巩固政权，和旧派妥协，抓住警察和特务机构。但是这些是人民不想要的。然后他们更用宗教去治国，政教合一，拥抱心自由主义，却无力治理国家。兄弟会原本就被前总统支持者所敌视了，而却又没有新的群众基础，所以第一年，Morsi 很快地失去人民信任。于是在 6 月 30 日开始有人运作要动员不满的群众去要求 Morsi 下台。

随着蔓延开来的抗议浪潮，军队介入掌控了局面，把自己当作“反 Morsi 革命”的领导者。许多埃及人把军队视为是必要之恶。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军队在 7 月 3 日后的行为。军队和反革命的报告说支持 tamarrod 的人，也就是反 Morsi 的人不应该把焦点从反兄弟会这点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但是，tamarrod 领导人所谓的反革命意义，和大众期待的却大相径庭。我和一些抗议群众闲聊，其中一个 4 个孩子的父亲，远从南部城市 Aswan 到 Cairo 来抗议，因为失业。他很

不满 Morsi，认为这个总统无心治理国家，禁止外国观光客。他在6月9日说，Morsi在30日后就得走人了，这一切就要结束了。的确，之后 Morsi 走了，可是军队和反革命分子回来了。

军队的目标不只是兄弟会，更是革命本身。像是 Mubarak 党人一样，他们根本不认同革命，不认为埃及需要改变。新的行动者、情绪、形式方式已经出现，但这些人会侵害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这些既有阶级包括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富人与穷人、专家与常民、男人与女人、老与少、老是与学生等等。为了确定这些阶级关系，老党人已经该使煽动民族主义，也包括了保守的宗教力量，再加上新字由主义，这是意识形态铁三角：道德、市场、军队。

这些有可能避免吗？若兄弟会的政策很开放、多元，且和非穆斯林革命派合作，还有非穆斯林革命人士也愿意承认兄弟会，那么，我想结果会不一样。的确，在兄弟会和非兄弟会之间的平衡或许会开启另外的辩论，像是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责任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民主的开展。这个政体或许不会处理是社会正义的问题，但是会让下层弱势有更多的力量。

这听起来像天马行空，但是这对突尼西亚有所影响。执政的 al-Nahda 若是更纳入民见反对的意见，承认他们对于自由权利的渴望，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执政。而若是反对 Ben Ali 的人可以承认 al-Nahda，那么他们就可以保住公共领域的自由。反革命若是成功，那么

推翻的不只是伊斯兰政府，还包括那些公民社会中反威权的力量。■

> 街头对抗国家

by Mohammed A.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美国,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



在埃及街头艺术很常见。这里的图画意思是把抗争和烈士连结起来。Mohammed Bamyeh摄影。

埃及革命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已经结束了：介于2011年2月11日和2013年8月14日。这是重要的一段时间，开始于旧政体的瓦解，结束于旧政体的复辟。这个政体现在宣称是革命政体。多数人抱怨穆斯林兄弟会，也给了军队介入的机会，把民选的总统拉下台。

可是，一切并不明朗，也不确定那些支持Morsi下台的人是否也支持8月14日的流血冲突。这里面，军队铲平了Morsi

的两个支持阵营，将近1000人，还有另外两个小规模屠杀。我们也不清楚那些希望军队掌控国家的人是否比Mubarak的支持者更团结。毕竟，没有什么比现在军队的暴政更像Mubarak的三十年执政了。在他的时代我们甚至没有看到那么整齐的支持政府的群众。3分之2的埃及省士都在军队的高压统治下。最显目的是过去的国安单位又回来了，整个好像没人质疑旧政府的复辟。这是个靠暴力维系政权的政

>>

府，鼓励反对者使用暴力，然后藉此有理由塑造一个警察国家。

整个埃及革命并不能以夺取国家权力来一言以蔽之。的确，许多革命的能量从2011年1月开始就被用来对付国家，而非要求特定的人去掌握国家。这个民意有其无政府的倾向，并且政党和军队从未了解。也的确，一个最少被提及的埃及革命特征是双重的动态性：一方面我们看到街头的动态并不被任何力量所掌握，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组织的力量，像是兄弟会和军队，还有组织的自由派政党，他们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想法和作法。没错，我们很惊讶埃及政治精英的知识平庸，这在现有的政府身上可明显看出来，像是他们转型民主的计划（简直就是老总统提出的没两样），以及其资助的媒体的素质低落，和危机期间无聊的阴谋论。

埃及革命就像其他的阿拉伯之春一样，是平民的革命。所谓平民，我是指那些没有精致意识形态的信念和政党认同的个人。那些在2011年1月前从未再接头上抗议和去投票的人。这些平民并没有遵照某个领袖或组织的纲领行动。小小的个体是推动历史的巨轮。虽然这些都在行动的文化中被深化了，像是艺术的创新和随处可见的辩论，但是这个革命并没有形成一个由下而上

的国家。对许多埃及百姓来说，似乎最希望的是一个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国家，而不是统治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从来没出现在埃及历史上，而且在8月屠杀后，这里想越来越遥远了。

现在的掌权者正在强化暨有的分化状态，这正是8月屠杀的后果。虽然这对政府巩固权力相当有用，但是这也是政党消灭敌人最好的方式。这个逻辑也产生了许多相互敌对的场面，让大规模屠杀顺理成章展开。8月14日，这场屠杀是以人民之名对人性的杀戮。Wafd党是多数自由派政党之一，却在第一时间替杀戮背书，认为安全是人民的渴望，认为7月26日对于Sisi将军的支持是给他权力去对抗“恐怖主义”（他可能意味着是3分之1的人口）。

但是即使8月14日发生的事情是人民的意愿，那还是一场违反人性的杀戮。这杀戮开始于很常见的准备：透过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论述妖魔化敌人，然后证明杀戮的必要。第二，这是一场需要政治决断的犯罪行为：政治是消灭敌人的艺术。第三，这个任务一定要达成。所有三者都是在进几个月看到的。但特别在7月3日之后，我听到了许多兄弟会的敌人说这是一劳永逸终止运动的办法。所以，这是一场违反人性的杀戮，相信没有流血必定无法成

功。若革命有所谓的理性的话，按照Herbert Marcuse于1940的说法，革命会因迷信而失败，因为人们必须从迷信中得到救赎。

■
注1：见Bamyeh, Mohammed A. (2013) "Anarchist Method, Liberal Intention, Authoritarian Lesson: The Arab Spring between Three Enlightenments." *Constellations* 20(2): 188-202.

> 从受辱到抗争

by Polat Alpman, Ankara University, 土耳其



Talcid Man是抗议中多个符号角色之一，代表了对抗催泪瓦斯的群众。

伊斯兰保守主义现在在土耳其掌权不只1次，而多达3次，每次当选支持度都提高，而且影响力从政治延伸到社会和文化领域。其试图要铲除土耳其军队，也想透过经济和政治改革开启Kurd族群和头巾等议题。此外，其把加入欧盟当作理想，并把土耳其当作全球资本的温床，企图在外交关系上发挥影响力。

好几年下来，因为这个政权得到了多数着支持，让其肆无忌惮想掌握社会生活。土耳其军队的影响力的确变小了，可惜警察的影响力增加了，变成好像只是政府的保卫队一样。学术和媒体也被审查（或是自我审查），夸张的所谓“伟人”或“绅士”等政治语言正在普及当中。

人民不满的情绪仍在蔓延当中，这从都市转型的牺牲者、被压迫的劳工、经济成长但是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却没有改善等等现象中可清出看到。监狱里的绝食反抗是要求可以用母语进行法律辩护。于May Day庆典期间关闭的Taksim Square，因为理由是捏造的，所以造成不满。其理由居然是说为了建造Istanbul的大桥，并以Yavuz Sultan Selim命名。此人是奥图曼帝国的统治者，屠杀无数的Alevis人民。其他像是在Pozanti监狱使用暴力、酷刑、强暴等方式对待Kurd族小孩的行径，还有2011年的Roboski/Uludere的Kurd大屠杀和2013年5月在Reyhanlı的“恐怖主义”炸弹攻击等。

Gezi 公园事件于是变成了抗议事

>>

件。然而对于首相而言，这个抗议是阴谋人士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攻击。首相的权力欲望和违背民主的作法马上让街头变成灾难现场，冲突不断升高，在5月31日的事件里面，若是首相没有把人民贴上打劫者或是特殊利益的鹰犬等标签，流血冲突是不会爆发的。他若是不要这样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抹黑抗议者，甚至还杀了抗议者，整建事情会变得很简单。

6月1日人民推倒警察架设的拒马，进入 Gezi 公园，在那里，人民的诉求被全世界听见了。警察撤退并且离开了，于是整起运动变成了所有人的运动。新的运动文化出现，像是幽默的表达方式，涂鸦、以及社会媒体。女性主义者和 LGBT 特别令人瞩目，其口号像是“别污辱女人、同志、性工作者”，或是“坚决反抗，拒绝言语攻击”。

6月15日星期六，首相在 Ankara 公开露面，宣成要揪出整起事件背后的主使者及其利益。他说接下来在 Istanbul 有公开活动，所以 Gezi 公园必须净空。接下来的警察攻击使用催泪弹、水柱、

警棍等驱离群众的作法简直荒谬，因为广场上的小孩和人们无辜被攻击。没错，首相的确在事后于公园出现公开场合活动，并且完全无视于那些被警察攻击而躺在医院里的伤者。

这场 Gezi 公园行动从抗议衍生成暴乱，并从暴乱变成抵抗，已经是土耳其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了。这个运动要求政治强人下台，要求民主法治。Gezi 运动的要求也强调正视 Kurd 族的相关议题。人民睁大着眼睛在看着政府如何化解这场正当性危机！■

> Gezi公园

反抗的艺术

by Zeynep Baykal,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ISA会员(RC05) 和Nezihe Başak Ergin,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ISA会员(RC21和RC47)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成为
为了展示抗议的平台。群
众抗议政府破坏Gezi公园和
Taksim广场。

“像树一样地独自生活，享受自由；像森林一样生活，团结一致。这是我们的渴望。”

Nazim Hikmet

对于2013年6月和7月的反抗，若要描述其感受，那可是很难的，因为这个运动不只对土耳其来说意义重大，对世界来也是如此。你随处可见 Taksim，也随处可见反抗。

“反抗随处可见”已经变成是琅琅上口的口号了。许多具有环境和都市意识的人就在 Istanbul 的 Taksim 抗议都市对于 Gezi 公园的破坏。然而，没有人想到保护两三棵树的运动会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抗争运动。

而我们也很难下结论说这是场反抗公园被破坏的运动。事实上，是因为首相干预人们的私领域，侵犯公民自由和人权所导致的结果。这是一场反对管制的运动。新的管制法案居然是在一夜之间没有付诸讨论与咨询便通过的，然后要求市中心和 gecekondü 的居民以及社会住宅及老旧小区的居民搬离。这持续2个月的压迫行动让一般民众也看不下去，加入了抗议的行列，警察的镇压成为转折点，抗议变成了战场。政府于是禁止5月1日的庆祝活，可是这个在 Taksim 广场的活动已经规划很久了。政府使用暴

力对待群众，对待那些反对 Emek Movie 戏院关闭的群众，相当恶质。该戏院要被改建乘购物广场，其他的戏院像是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 和 Muammer Karaca 戏院也有同样的命运。讽刺的是 Istanbul 其实是2010年欧洲的文化首都呢！政府现在不屑一顾各种形式的艺术元素，像是演员、预算、服装、剧本、演出等等。

在 Taksim 团结的旗帜下，专业团体、政治组织、小区协会等集结一年的时间，关注并为相关的都市问题发声。不同的左派、社会主义者、Kurd 族人、无政府主义者、LGBT 团体、凯末尔主义者，以及一般民众等，特别是 X 和 Y 世代的青年，都一起走上街头。

Gezi 公园是这个城市的居住权利、使用市中心的权利、参与空间生产决策的权利、以及以艺术表现城市的权利的一盏明灯。和反抗最有关的词汇是 *çapulcu*，是首相 Erdoğan 用来称呼广场的人为“打劫者”的词。这个词被抗议者挪用，赋予正面的意含，意味着人民非常骄傲地为权利、尊严奋斗，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公民反抗已经超出了

政党政治的界线，成为了集体表现、语言的载体，是“团结论坛”的一种形式。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以往所谓的“信息管道”只提供意识形态，如今政治艺术用创意的幽默打破了传统游戏规则，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让当权者惊讶其挑战旧传统的方式。在抗议的紧张气氛中，想象、艺术、幽默生产出了新的希望口号，并在街头上传颂开来。

多元的影像、大众化的角色、文字、文化元素反应了不同团体的多元性，但是核心是一致的：民主。在80和90年代的“不平衡智力”的幽默文化展演控诉去政治化的现象，艺术的反抗形式则反对“不平衡的警察暴力”，因为警察暴力造成了6死、百人受伤、15人失明的惨剧。抗议者唱“*Çapulcu*”之歌，到大街上游行。大众电视的节目演员像是 Muhte em Yüzyıl 和 Behzat Ç. 则出现在抗议现场之中。不仅来自土耳其，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像是 Patti Smith、Joan Baez、和 Roger Waters 等也用照片、影片、音乐会等表达支持之意。电影上的

标语也出现在运动中，像是 V for Vendetta (V 怪客) 被改成 V for Mrs. Vildan，用来描述参加者的太太；Daytime Clark Kent, Nightfall Superman 代表白领阶级下班后参加运动；而歌手像是 Justin Bieber 被改成 Just in Biber/Pepper 用来表示警察驱散群众的器具；歌曲像是 Everyday I' m shuffling 改成 Everyday I' m çapulung；此外还有足球广告歌曲 Nokia connecting people 改成 Fascism connecting people。

在 Taksim 广场的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 的前端则成为抗议者的“共同外表”，就像在 5 月 1 日庆祝中所展示图案一样。还有其他艺术的创作，包括剧院、舞蹈表演、电影、音乐。最重要的动物角色则是“企鹅”，用来指 CNN-土耳其的电视台，因为每次警察暴力的报导都会出现这个角色。而 Standing Man (duranadam) 总是站

挺着，默不作声，持续 8 小时。这是 Gezi 公园的英雄，像是 Talcid Man (Talcid 是胃药，用来减少胡椒喷雾的影响)，或是 Woman in Red (面对胡椒瓦斯攻击的女人)。这些都是脸书上大家的集体创作。Standing Man 其实是编舞家 Erdem Gündüz，就站在 Atatürk Cultural Center 的前面，而且就只有站着，开启了抗议的新型式。其他人则是在警察面前看书。其他形式则有讽刺首相的言语等方式，例如“茶壶和锅子，一样吵”则变成“用茶壶和锅子一起抗议”。当政治气氛缓和时，群众会在阶梯上划上各种颜色的彩虹。

总之，在 Taksim 广场和 Gezi 公园的抗议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集体记忆、新的语言，不同于以往。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个特点，可是政治人物并不情愿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都市空间已经显示出了政治所造成的

不正义后果。这种不正义反应出了社会分化，而艺术则表现了普世的团结，触动了我们最深层的良知道德。集体艺术 çapulcu (chapulling) 或许会被洗掉，但是却无法从 Gezi 公园抗议活动参加者的心灵中抹去。对于那些牺牲者：Ethem Sarısülük, Abdullah Cömert, Mehmet Ayvalıtaş, Medeni Yıldırım, Ali İsmail Korkmaz, 和 Ahmet Atakan，我们不知道如何弥补伤痛，但是我们用墙壁上的乐观口号来继续前进：“擦干眼泪，明天会更好。” ■

> 印度的 空前实验

基本收入补助变革

by Guy Standing,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英国

全球化不仅带来了不平等，也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举世皆然。政府也无法透过社会政策去除这些民众的不安。所以他们转向使用手段试验、行为试验、选择、针对性、条件性等的方式去解决不平等，如此一来，解放性的普世主义方式已不见踪迹。

在这个脉络下，有人想出来了一种新的普遍政策，那就是现金补助。虽然这个政策条件式版本很多国家都采用，可是无条件式的现金补助却没有例子。我加入 SEWA（自雇女性协会）推行这项计划。该计划受到 UNICEF 补助，研究这个实验在印度的成效。

在印度，这种现金补助方案还颇有争议。一方面，食物补助的支持者想要把整个分配系统扩展到 68% 的人口，正如食品安全法案所规划的一样，现在正在国会等待通过；但是批评食物补助的人认为这会恶化贪污，而且食

物的质量堪虑。另一方面，现金补助的支持者则被批评为想要取消公共服务和削减社会支出。真正的问题是现有的福利政策忽视了 3 千 5 百万的人口（30%），这些人都是贫困人口。

所以，2011 年我们发起了两个前导计划，测试现金补助的成效。计划由 UNICEF 补助，由 SEWA 执行合作。我们在 Delhi 于 5 月 30-31 日发表研究成果，有乡村发展部长和计划委员会主委参与，他们是现金补助计划的负责人。另外应 Sonia Gandhi 的要求，我们还做了一场不公开的简报。

在 Maydhyar Pradesh 的 8 个村落中，妇孺每个月可以领到 200 卢比（大人），小孩则是 100 卢比，后来我们增加到分别 200 和 150 卢比。在部落也是，大人 300、小孩 150 卢比。有一个部落作为对照组。

现金发放直接给个人，一开始是转到他们银

行或合作社户头。政府后来知道若政策要成功，这是必要的。

在实验组里面，村民不能把食物补助换成现金，以及没有任何领取限制。这两个我们严格执行。而倾向条件补助的人则说他们不相信人民知道自己最佳的利益为何，但是政府知道。

然而这个计划的设计者相信这个收入补助将会运作得很完美，并搭配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会很完善；另外若是透过 VOICE 组织，像是培力会员集体行动，那会更棒。我向来的信念是唯有最弱势的族群有制度性的代表，这个计划才可以运作得很完美。所以为了检视我的理论，我和 SEWA 合作执行这个实验。

批评者认为现金会被浪费掉，而且有通膨问题，并且让经济成长减缓，因为劳动人口减少了。支持者则想说这个计划可以增进生活水平和小区为主的经济成长。

有补助的小孩更有更好的学业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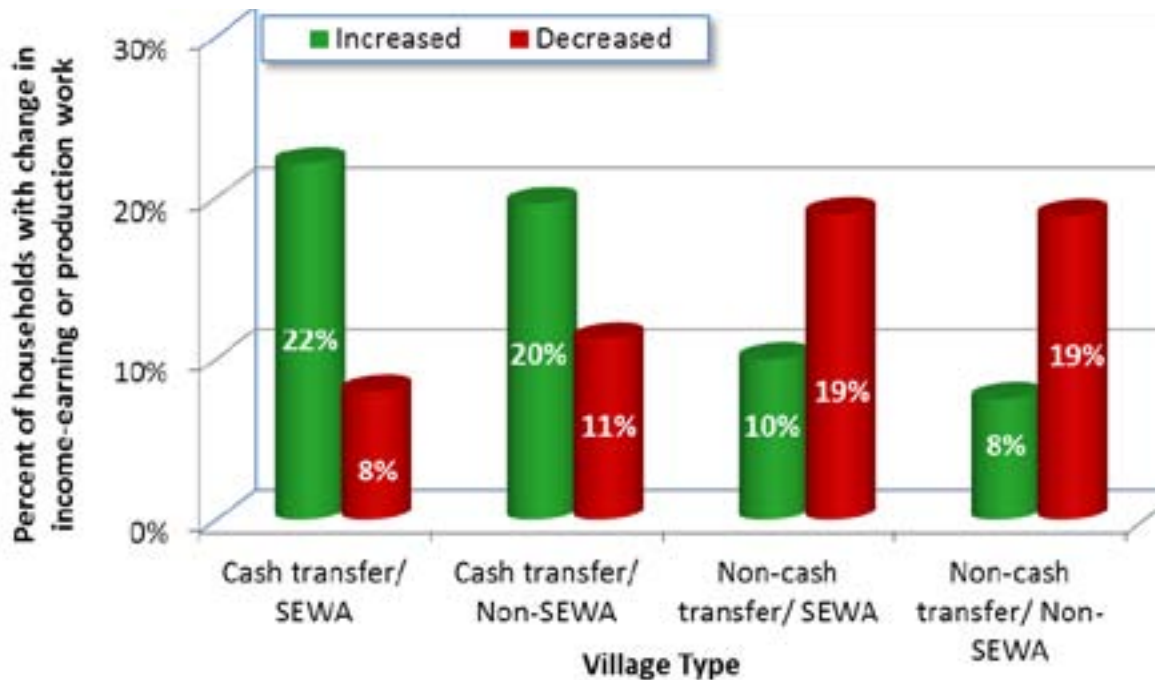


图1

我们都同意要让样本可以包括人口、社会、经济的代表性，而后的调查问卷设计也是遵守这个精神。我们研究18月来的影响，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法，比较那些有接受补助和没有接受补助的村庄家户。此外，超过80个的个案访谈也由另外独立的研究团队负责。

我们还有很多分析要作，不过目前的发现很清楚。在我讲实验结果前，我想强调，多数人其实不喜欢食物补助（米、麦、糖等），且喜欢现金计划。11项的结果可以清楚发现这个事实。

1. 许多人把钱用在改进住宅、厕所、墙壁、屋顶等，还有预防疟疾。

2. 营养状况得到改善了，特别是 scheduled caste (SC) 和 scheduled

tribe (ST) 的家庭。或许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儿童的体重有显著增加（世界卫生组织 z 分数），女童尤其明显。

3. 多数人从配给商店到市场消费，应该是资金增加的缘故。这增加了饮食质量，吃更多的蔬菜水果，而不再只是配给的谷物，有时还有石头参杂在里面。改善的饮食帮助减少疾病，增进活力，但是也越来越多人去看病和使用私人健保。我想公共服务这方面要加强！

4. 健康的改善也让就学率和学业表现更好（图1）。这也是家庭有余裕去买鞋子和付交通费的缘故。让家庭自发行动是很重要的。也没有必要采用昂贵的条件式方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以成年人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

越像成年人。用小孩的方式对待，他们就永远还是小孩。条件式方案在道德上并不被接受，除非你想用在自己身上。

5. 整个看起来有相当正面的平等结果。而对于弱势来说，影响更大。弱势包括了低卡司特阶级家庭、女人、残障等。他们有钱了，也提升了他们家中的影响力。以往社会政策忽略的是培力残障者。

6. 基本收入补助也开启了小规模的投资，像是种子、纺织机、开小店面、修理装备等等。这会增加产出和提高收入。这意味着可以抵销因为增加基本消费而造成通膨的影响，然后也发现被政府分配系统所取消的谷物会再度出现在市面上。

7. 和怀疑者的预期相反地是，补助带来了更多

有补助的家庭工作收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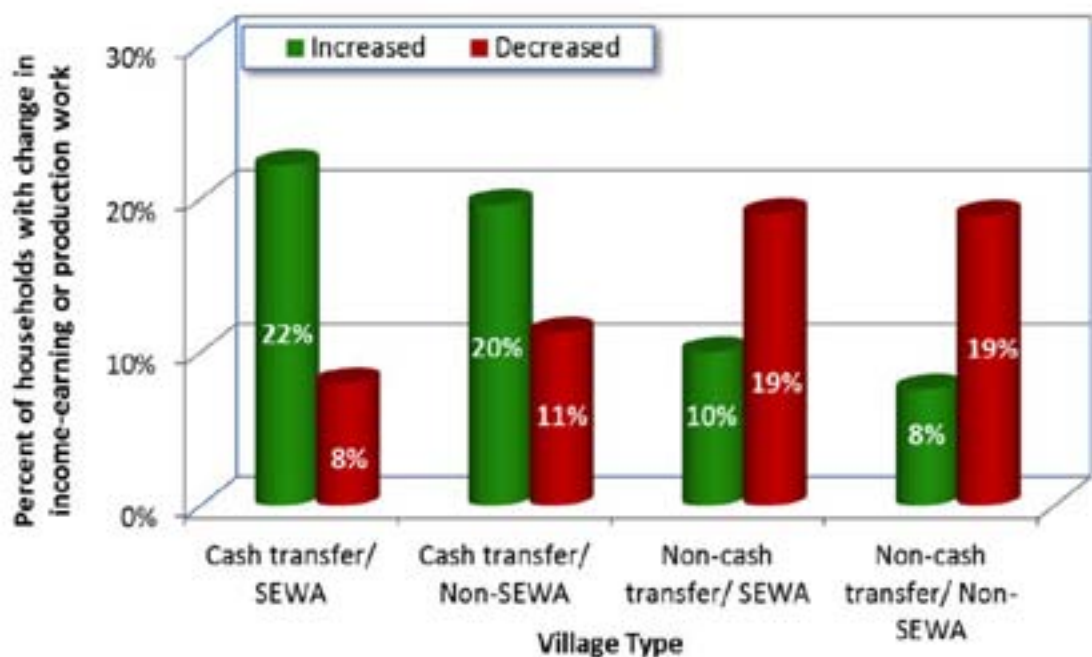


图2

的劳动力和就业（图2）。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整个劳动从工资劳动转变到更多的自雇者，像是农夫或是商业，也减少了失落的外移者。此外女人受惠更多。

8. 没有预期到的是，卖身绑约劳动 (bonded labor, naukar, gwala) 减少了。这对在地发展和平等来说是很好的。

9. 原本有基本收入的人更有可能可以有能力还债和减少高利贷。原因是为了短期而借贷的需要减少了，那月息可是高达5%！的确，抱怨这个计划的人都是那些放款者。

10. 我们不能忽略

低收入户的财务自由度。因为钱被政府和放款者独占，算是稀少货品。若是绕过这些是可以减少贪污。即使在贫穷家庭领到补助后，许多人还是把钱放存起来，避免当财务危机发生时无法调度资金解决问题。

11. 这个政策相当有潜力转变家庭和村庄。整体影响超出于个体影响的总和。不像食物补贴政策会默认全力结构和恶化贪污，收入补助现金政策培力了人民，并有助于平等与发展。

我们的论证是普遍的补助政策比特定的补助所花费的成本较少。特定补

助其实在设计和执行上很昂贵，而且排除掉了很多人，因为研究显示只有最贫穷中的人才可以拿到补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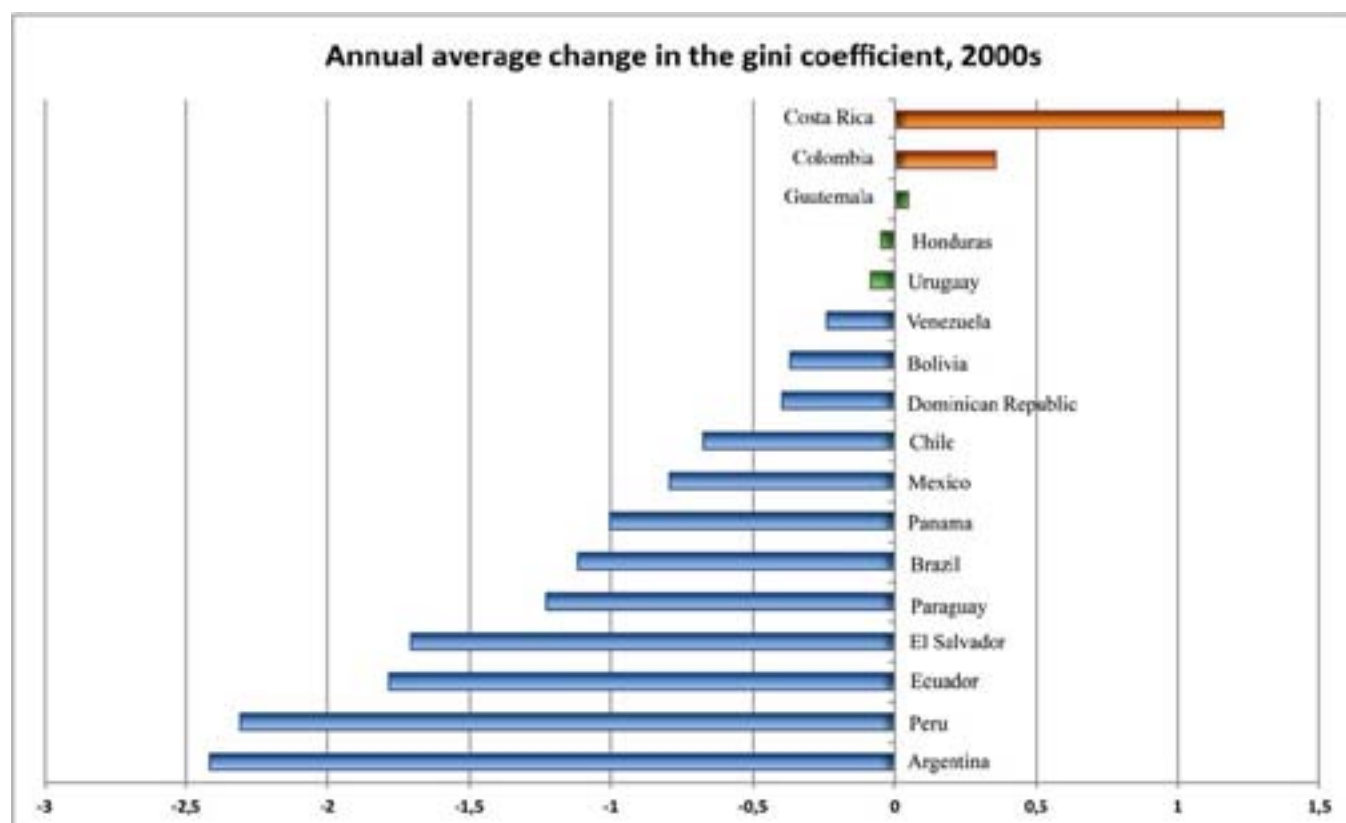
总之，基本收入补助是21世纪很重要的一种社会保护系统。这也是印度社会政策的重要时刻。过时的父权政策必须扬弃，改以更进步的方式推行。■

> 拉美不平等的下降

下降多少？ 持续多久？

by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ISA会员(RC19), Diego Sánchez-Ancochea,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国

拉美变化中的不平等。



拉美传统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平等地方，因为政府失灵、精英垄断、社会分裂等等使得没有办法降低贫穷率。可是过去10年来，整个区域以及18

个国家中的12个可明显看到所得不平等的下降。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政治有所谓左转，民主转型通常是保守政党主导，在2000年前后左派政党纷纷执政，从委内瑞拉到

>>

智利都有左派政府，所以这个因素不可忽略。不过不平等在保守政府执政下也下降了，像是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总之，政策上的改变反应了人民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和对于市场所宣称的可以带来更多机会和资源的厌烦。

许多新政府得利于正向的外部的环境。中国政府为了塑造其经济奇迹，大量购买了各种资源，所以国际上的天然资源价格飙涨，让拉美的出口提高许多。在 2000 年和 2009 年之间，拉美出口到中国成长了 7 倍，使得新的社会政策得以施行。

财务和政党的结合带动了这一股改变。政党相信政府应该扮演重分配的角色。就业率和最低工资也提高，并且社会政策扩张。在 2008 和 2012 年，拉美甚至在全球经济倒退中杀出血路，保住了就业率和社会政策。超过一亿人受惠于所谓的“条件现金转换制度”：金钱和社会服务的转换。

当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比较成功，但是可能只是在提供就业的部份而已，社会投资或许不那么理想。巴西是个例子。在巴西的劳动常

态化和最低工资提高是很令人瞩目的丰功伟业，在 2002 和 2012 年之间，巴西的中产阶级从 6 千 9 百万 (38%) 增加到 1 亿 4 百万 (53%)。乌拉圭是唯一成功利用集体议价方式让人民受惠的国家。其他国家则在社会政策上表现不凡，但是在改善劳动条件并不理想。这样不一的表现也让各国的反应不同。智利人民认为很好，但是玻利维亚人民认为这是不好且民粹的表现。

最近的发展让有些人开始谈论拉美的新时代，也讨论作为世界其他国家范例的可能，因为不平等在西班牙到中国等国家仍然持续恶化。不过我们不能太过娱乐关。

第一，2000 年之后的成长趋势并没有扩展到中美洲。那里人口有 8 千多万。巴拿马仍然出口劳动力，大多往美国。而萨尔瓦多是唯一不平等下降的国家。(但是数据有问题，因为暴力很难接触到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中美洲国家多半无法增加政府收入，减少精英阶级的影响，并且同时发展好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质量。

第二，整个区域来讲，富人持续独占资源，

并且课不到他们的税。除了在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油和瓦斯是例外，其余皆被独占。以家族为主的企业文化仍然让这些企业非常小气。在巴西，最富人似乎少了，但是在 São Paulo 的最高阶级仍然收入高达 600,000 美元，比 New York 和 London 还高。

最后，经济没有转型。跟前一个世纪一样，拉丁美洲还是出口原物料，换取较高价的制造品。这点特别令人担忧，不仅因为这让就业率增加减缓，还让经济更加依赖中国，而且破坏全球生态。■

> 在非洲的中国

by Ching Kwan Le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美国



在地底钻洞采矿的中国矿工，位于Chambishi Mine。Sven Torfinn摄影。

亲爱的 Michael，这是来自 Kitwe 的问候！

是的，我在作田野，在你以前的田野地点：赞比亚 Copperbelt。这个月我在 Nkana 矿区，居民说这里曾经叫做 Rhokana，也就是你在 40 年前 The Colour of Class 书中所研究的地方。现在我就在同一个地方呢。你或许知道，赞比亚因为 IMF 的压力，政府私有化了铜矿产业，并在 1997 年早已开始。Nkana 是和 Mufulira 一起卖给 Glencore 的，这是一间恶名昭彰位于瑞士的公司，而现在的矿场叫做 Mo-pani Copper Mines。

在那边的房子或许你住过喔。现在那些房子是管理阶层、工程师、地质学家的办公室。矿场外围的高密度的住宅区，矿工都住在那儿，污水处理站就在中间，然后没干净的水和电。每次我看到小孩在那些脏乱危险的路边逗留，我的心就凉了。我不知道你离开赞比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国家最充满希望的时候？或许吧，不论如何这个国家萧条了 40 年，死气沉沉。只有在 2004 年，当全球因为中国和印度的需要而铜价飙涨，这里的经济似乎看到一线希望。可是现在失业和贫穷仍然随处可见。

我于 5 年前开始来赞比亚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在非洲的发展。我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劳动的学者，对于西方媒体口中的“中国劳动剥削”和“中国新殖民主义”感到兴趣。的确，中国的标志在这里处处可见，像是中国银行，或是中国建造的道路，或是中国出资建造的 Ndola 鸟巢体育馆，以及许多位于中国赞比亚经济合作示范区的基础设施等等，另外还有中国国家拥有的 Chambishi Copper Mine 和 Chambishi Copper Smelter。

可是我来之后马上就了解到中国的资本不过是大量国际资本抢进赞比亚的一部

分而已。这里最大的矿产公司，Konkola Copper Mines，是属于英国的一间跨国公司叫做 Vedanta。另外巴西的 Vale 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企业之一，最近买下了 Lubambe 矿，还有 South African First Quantum Minerals 公司则在 Kansanshi。和瑞士公司 Mopani 的例子放在一起来看俨然就是比较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我的问题是：中国在非洲的资本有何特殊之处？我希望用双重的比较，也就是比较中国和非中国的公司、以及比较建设业和矿业，去找出中国资本企业的利益、能力、实践，不仅看看他们如何“资本”，也想知道他们如何“中国”？

所以我们两人研究若作个对比，则可以看出赞比亚在过去 40 年的政治经济如何急速的转变。现在，外国资本可说是这场历史游戏的主角。我总是把他们想象成门禁森严的王国，城堡设下重重检查和财产权声明，唯有透过个人管道才可以一窥究竟。我是两间公司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和 Roan Selection Trust 的人力部职员。我用同样的方式想要进入中国矿业公司，可是那里的中国共产党秘书人员上网 google 我，查出我的身份，并且很怕我的研究会触及中国和赞比亚劳动抗争的主题。他后来给我上了一课，说所谓的“中国觊觎非洲”的说法恰恰就是西方国家羞辱中国的最好例证。我别无选择。但是我也很幸运，就像其他田野工作者总是在某个时刻会好运降临一样，我变成了赞比亚反对党领袖的好朋友，他对我研究中国和赞比亚的主题感到很



赞比亚工人面对中国上司。Sven Torfinn 摄影。

有趣。他知道我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矿业公司后，安慰我说：“没关系，等到我们执政！”我等了，而他们也的确赢得了 2011 年的选举！我的朋友是副总统！他打电话给联络给主要矿业企业的主管，并让我成为赞比亚政府顾问！

这个小故事让我们知道非洲国家和跨国企业之间的利益结盟，提醒了我必须严肃地看待赞比亚国家的角色，不要小看他们。你在 The Colour of Class 的论证受到 Frantz Fanon 的影响，认为政治的独立若没有经济的结构转型，国家是没有自主性的。可是现在，赞比亚的一党专政 First Republic 在 1991 年后被多党制度取代，并伴随着 World Bank 和 IMF 的私有化计划。这 20 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化也恶化了大众对于不平等和贫穷的抱怨，使得执政党必须好好处理外国资本的问题。最近由于对于这些国外资本的不满，赞比亚政府课征暴利税，但后来取消了，也单边取消 Development Agree-

ments 所规定的私有化矿产、把矿场忠诚度提高两倍，并且训练人员到矿场中去稽查审核。我把我的研究看成是这个政府努力的一部分，试图让整个产业在财务上和社会学上更容易理解。的确，政治人物要利用这种资源民族主义的浪潮去，透过分配矿业资源给选民以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并累积国家的发展能力，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和赞比亚政府合作只能用这尖锐的事实安慰无奈的自己。

中国和非中国的外国资本将怎么影响非洲？我会用一本书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是我和全球社会学对话的引言。■

> 乘风破浪

讨海人的工作和生活

by Helen Sampson, Cardiff University, 英国, ISA委员(RC30)

菲律宾船工Miguel在列阳下等待工作指令。Helen Sampson摄影。



讨海人是船末在栅栏上的人。墨西哥的阳光直射着他。空气也仿佛振动着他。讨海人也负责缆绳，带着VHF收音机，等待命令。他在那待命已经2个小时了，不能离开。他也没办法找寻阴影，也没水可喝，甚至不知道还要等多久。这艘是大船，在墨西哥的港口停泊，但是迟了。导航员正等待引导这艘船到海洋上。船长都在待命，可是迟迟还没启航。讨海人的又渴又累，但是从不埋怨。

我在船上作参与观察时遇见这个航海者（注1）。这研究受英国的航海者国际研究中心（SIRC）

>>

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在 Cardiff University。他叫做 Miguel (注 2)，我随着他和他的船员一起出海，在一艘于日本建造的老货船上。这个老货船以现代的标准来说算小，只有 40500 吨位，总长 179 公尺，宽 30 公尺。这些航海者都是男性，来自 5 个国家。舱员 3 人来自克罗地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另外 2 人，其中水手来自菲律宾、维修士来自土耳其。Miguel 是菲律宾籍水手，但不是最下层的水手。他和他的同胞被雇佣 9 个月，由一家航海者人力公司中介。若他抱怨的话会马上被遣送回国。一旦被遣送，他会进入黑名单，然后可能就无法继续讨海维生。而他为他家人建造的新房子也不会有钱继续建造，也没钱继续帮他父母亲买医疗保险，小孩没法上学，依赖他的亲戚也会没钱。所以他从不抱怨工作，想都没想过。

他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填满，一周 7 天，合约期间不曾休息。一位航海者这么说：“我的工作很可怕，要很操劳，全年无休，日以繼夜。”有时若传离港很远时，非瞭望者

可以休星期天。有些船可能有烤肉。不过多数的船上，星期天跟其他天一样，只多了几个小时的休息。入港时也为了不要打扰工作的步调，也跟出海一样。可是船这样不停的跑，钱都是船公司在赚，工人不会加薪。靠港装卸货物完后又随即要出港，讨海人也没时间到地面上休息。这艘船就像监狱，不过因为这样国际公司的薪水，让这些工人愿意替他门工作，牺牲家庭时间。一位讨海人这样说：“船上的生活无聊透顶，我想我的家人和小孩，但是我得不断辛苦工作。”

可是，对许多讨海人来说，薪水还是很高的。可是工作也相当危险。2011 年 11 月，North Wales 港外的一艘船解体两半，船上 8 人有 6 人罹难。生还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眼睁睁看着船解体，但却无法就我的船员”（注 3）。类似的事情并不少。2010 年，每 670 艘船就会有 1 艘船失踪。当然还有其他风险：像是背伤、断指、骨折、眼疾、货物和机具的危险、吸入有毒气体等等。另外还有心理疾病的问题。他们通常用英文（非

母语）和其他人沟通工作事项，然后鲜少联络家人，食物糟，拥挤的宿舍等。还有，他们很难远里管理者的监督。船上生活就是这样层级鲜明，不分工作与休息都是如此。■

注 1： See Sampson, H. (2013) *International Seafarer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注 2： Miguel 是为了保护田野受访者的化名。

注 3： BBC 新闻：“Swanland shipwreck to be examined by robot submarine,” 2012 年 1 月 6 日。

> 波多黎各

屠杀之岛？

by Jorge L. Giovannetti,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San Juan,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屠杀：四人死亡便是屠杀。

波多黎各在 2012 年有 10 起屠杀事件。5 月的时候，媒体报导总共有 6 起屠杀事件发生在这个美国拥有 3.7 百万人的属地上。

在 2011 年时，波多黎各的杀人案件就被联合国的 Global Study of Homicide 和 New York Times 大幅报导，引起注意。16 个月内发生了 16 起屠杀事件，但国际却不曾注意到。虽然我不是要将杀人统计数字和一个国家的国际能见度相提并论，可是我要指出的是：很令人惊讶的，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电影院持

枪扫射案件居然比波多黎各平均每月发生一次的屠杀要来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国际间虽然不太注意这个新闻，可是在该地却早也不是新闻了。媒体总是注意只发生一次的事件，特别是要在西方国家。而另外一方面这些屠杀事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是因为数次和命名。在波国，只要有 3 人死亡的事件就叫做屠杀了。

在地方上，这样的定义似乎没什么问题，也宣称是警察用来归类案件的标准，可是，当警察当局没有用屠杀来描

>>

述 3 人以上死亡的案件，那么犯罪学家就会抨击。一位刑事教授就认为这样的用法很合理，因为“不论传统或规范上来说，这个名字就是用来描述 3 人以上的死亡案件。”

但是全球性的比较框架，或是当波国在报导屠杀事件时，这样的用法就有问题了。例如，波国的报纸利用标头版面写上大字“屠杀”曾经描述过 2 见数量上不同的案件：当地的 4 人车对车的相互攻击案件，以及在挪威有 69 人死亡的案件。很明显的，这样把差异无差别化的方式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关于大屠杀，Jacques Semelin 认为“社会学忽视这个领域已经很久了，并让位给历史学”。的确，历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告诉了我们很多集体暴力的事情，不过通常局限在种族大屠杀。包括 Charles Tilly 在内的学者分析了集体暴力的变异，而 Wolfgang Sofsky 和 Semelin 已经列出许多特征，并定义为是“集体行动，企图杀害那些非士兵的平民。”可是，没有人要死多少人才算屠杀。所谓“三人以上”的说法是 Guatemal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提出的，而且也要有其他条件也符合才行（意图消灭对手、制造恐怖、残酷对待受害者、系统性准备）。

让我们回到比较单纯的案件上面，先不讨论 3 人死亡是否试图杀这件事情。上面定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屠杀是种族清洗的一部分。这包括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意向性。车对车的两方贩毒集团的相互扫射算是吗？

Breivik 想要把挪威工党全部消灭有符合定义吗？Adam Lanza 把看到的小学生都射死了，这有符合定义吗？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当然要对于个人行动和集体暴力与大屠杀之间的连结有更缜密的分析才行，而这也是屠杀之所以是社会现象的原因。许多人认为一旦我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在叙利亚 2012 年 Houla villages 杀人事件），那么是否称之为屠杀就不重要了。可是，没错，或许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命名不该只是我们理解上的方面之门而已。

此外，若我们从 Pierre Bourdieu 的观点来看，命名就是创造。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只把屠杀的定义和死亡人数关联起来而不考虑其他的社会学面向。但是这么作可不是无关紧要。最近，波国热烈讨论死刑处置屠杀者的议题。而要见到一次屠杀也不是太难，毕竟平均一个月一次，而且都会被起诉。照 Bourdieu 的观点来看，“法律论述是一个创造的言论，可以把说出来的东西带进来这个世界。”若屠杀可以是任意 3 人死亡的案件，以及要用死刑来惩罚的话，那我想社会学家是应该介入给个更精致的概念化去理解杀人案件了。■

> 南方内部 对话的阻碍

by Eliana Kaimowitz,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w, Justice and Society (Dejusticia), Bogotá, 哥伦比亚



35

| Arbu绘。

试着把自己想象着一个人权运动者，从南美的一个城镇来，努力想阻止欧洲采矿公司在自己的家乡所造成的水污染。而最近听闻非洲的某个人权分子在相同的例子上成功了。最理想的状况是你直接联系这个人，无论是打电话、写信等等，或是拜访他。

>>

我想，人与人的联系没有比信息分享这件事要来得更重要的了。

你会想说，是的，这两个运动者想见面交换讯息的话，可以在飞机上见面，然后脑力激荡一下。这对于美国人或欧洲人当然可能，但是对于全球南方的运动者来说可是行不通的。

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可是个全球化时代，信息无限，但是两个南方的人要见面却是如此费时、费钱、还要通过层层官僚关卡与阻碍。即使旅费有着落了，还有签证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飞机都要通过欧洲和美国，还包括哥伦比亚的入关。所以机场中标示“需要签证”其实意味着“非请勿入”。

作为 Dejusticia 的研究者，我在 Bogotá 的人权团体工作，已经意识到这曾困难了，因为我们的全球人权领导计划试图要建立更多南方国家之间的对话管道，即使有成功的案例，可是通常都是因为重重关卡，包括填表格、等待核准等等，所造成的时间、金钱、甚至情绪上的成本消耗而感到挫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个人之间的联系在北方和南方是大不相同的。

在肯亚和哥伦比亚之间有一个成功的司法交换个案，是在 2013 年 Bogotá 的宪法法官案例。这个案例让我们知道了南方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是可能的，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族群、政治、甚至贫穷的经验。但是想想看，美国和哥伦比亚的陪审团之间可能就很难有什么交流，可是美国法官可以很方便从 Miami 飞到 Bogotá，而且若回程要在巴拿马转机，也不需要签证。但是，肯亚的法官若是需要过境欧洲或美国的话，就需要过境签证。

最近 Dejusticia 组织了一个为期一个星期的工作坊，让年轻人权工作者参与，主要来自全球南方的那些对抗采矿公司的组织。他们和社会学家见面，然后学习沟通和研究的技巧。在审查之后，16 未来自南美、非洲、亚洲的参与者脱颖而出。不过在他们来以前，还要通过层层签证关卡。我们有来自乌干达的伙伴



| 南方对话！

需要签证，可是她却要在 London 办理，因为哥伦比亚和乌干达没有邦交。也有从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伙伴必须先飞到他的国家首都，然后办理澳洲签证，然后飞到 Sydney 去办哥伦比亚签证和美国的过境签证，最后飞行 24 小时经过纽约转机到哥伦比亚。很明显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和航空公司从没考虑过全球南方国家的需要！

全球南方的种资源的缺乏会造成什么后果？会阻碍了什么样的信息流通？北方和南方都需要开始审慎去思考这些问题才是。北方应该开始着手取消过境签证让信息传递更方便。南方也要一起破除这些障碍，让信息和人员流动地更有效率。第一步就是要取消南方国家之间的签证，至少让那些运动者和研究者可以不需要这写麻烦的手续，否则我们会丧失很多契机与人才来一起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

> 缓慢，但是坚定

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学

by Lekë Sokoli, Albani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irana, 阿尔巴尼亚, ISA 会员 (RC20和RC31)



第6届阿尔巴尼亚社会学国际会议：“动荡时代的教育：欧洲和全球脉络下的阿尔巴尼亚”，11月21-22日，2011。

过去20年来，阿尔巴尼亚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经济上，我们从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到了自由却混乱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我们从斯大林式的威权政府转型为问题层出不穷的民主制度。社会上，我们从均贫变成了东欧最不平等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俨然成为研究快速变迁、社会问题、国际移民（35%永久移民、15%暂时移民）的实验室。

阿尔巴尼亚的后共产转型也带来了社会学。在许多的东欧国家中，社会学有其传统，即使在最极权的共产国家亦是如此。可是在阿尔巴尼亚，社会学完全被禁止。过去 University of Tirana 从未有过社会系，而阿尔巴尼亚国家研究院的40几个院所中就是没有社会学。马克思列宁是唯一的真理，而共产党拥有绝对无上的诠释权，没人有办法挑战。因此社会问题不需要经验证

据，只需要用意识形态就可以指出。传统的思潮，像是存在主义、佛洛伊德心理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通通被禁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杜思托也夫斯基、沙特等等亦是。涂尔干、齐美尔、柏瑞图、波普、米尔、帕森思、默顿等其他思想家也不见踪影。

对社会学的反对力量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在这本着名的书 *Current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

in Albania 中可以看到 (由国家研究院于 1985 年出版):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布尔乔亚社会学的始祖。孔德的实证社会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为了调和无产阶级和布尔乔亚之间的矛盾而产生,也是为了平息阶级战争而出现。

在本书中,社会学被视为布尔乔亚的、反动、种族主义、反人性、且帝国主义。直到 1990 前,世界上所的社会学家都是危险的,所以该禁。唯有阿尔巴尼亚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在独裁者 Enver Hoxha 于 1986 年死后,社会学才萌芽。在第 9 届共产党大会上,新的领导人 R. Alia 这样描述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

技术与自然科学的优势不能抹灭经济、哲学、社会学、法律、教育等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我们考虑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所以官方的社会学发展已经开放,但条件很严格:(1)只能是阿尔巴尼亚的;(2)是战斗的社会学,因应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以及(3)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以此为基础。

很明显第,社会学要发展,那必定要等到共产

主义垮台后才得以可能。第一步是制度化社会学,创立阿尔巴尼亚社会学会(ALSA)。这个建立在 1990 年大转型时实施了。但是这个组织却瓦解得很快,因为会员太多了,包括哲学家、人口学家、律师、历史学家、医生、小说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记者、甚至建筑师。第二是因为政治力的介入。

第二步是系所建立。在 1991 年 9 月, University of Tirana 哲学和社会学的教授所组成。可是一年内这个师资就解散了,由于第一个民主政体的介入。这个民主政府在 1992 年 3 月选举赢得压倒性胜利而执政。这是所谓的民主政府版本的对社会学的反制。

1998 年,两位阿尔巴尼亚社会学先驱(Tarifa 和我)在美国成立了阿尔巴尼亚社会学的国际期刊,叫做 Sociological Analysis。那时候是本国史上的重要时代,因为当时的社会抗争、政治动荡、经济解体相当明显,社会结构整个崩解重组。

在经过许多努力的成功和失败之后,阿尔巴尼亚社会学会于 2006 年 11 月成立,并更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研究院(AIS)。从 2007 年 4 月 16 日开始,AIS 是 ISA 的会员,然后 2008 年的 10 月 10 日成为

了欧洲社会学会的成员。在 AIS 和 ISA 的协助下,巴尔干社会学论坛于 2011 年 11 月在 Tirana 成立。

在 AIS 的带领下,社会学开始起飞了!第一个社会学系建立了,其他学校也陆陆续续跟进。现在许多阿尔巴尼亚的大学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学士、硕士、博士诞生。从 2009 年开始,阿尔巴尼亚政府把社会学纳入成为专业学科之一。所以社会学也从高中教起,更多的智库愿意从事社会学研究。

从 AIS 的第一次大会后,会员从创始的 35 个成长多了 7-8 倍。参与的论文也从第一次的 12 篇到后来的 410 篇(2007 年),由 587 位作者发表,来自 22 个不同国家(2012)。我们现在扩张了社会学的书籍和期刊: Social Studies, Sociological Analysis, 和 Sociological Lens。

若这个“社会学转型”是成功的,那么挑战仍然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建立更有效和民主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学会(AlbSA),纳入所有阿尔巴尼亚社会学家,然后继续组织会议、论坛、和跨国的合作,慢慢扩大社会学对于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来说,相当重要! ■

> 动荡年代

第三届国家学会大会

by Ayse Idil Aybars,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经过了整天的会议，大家精疲力尽，于是在娱乐时间跳土耳其舞蹈。或许是另一种精疲力尽吧。

第三届国家学会大会于2013年5月12-17日在土耳其Ankara的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METU) 举行，由该校的社会系共同筹办。大会主题是“动荡年代的社会学：比较取径”。参加者则是各个国家的社会学代表组

织。

我是大会协调者，我很荣幸可以担任这次大会的这项任务。我可以说，整个会议经验相当棒，而且很有意义。整个筹划时间整整一年，将各国杰出学者齐聚一堂，还包括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专家、管理者、资金赞助者等

>>

等。我们当然也确定所有的参加者可以有机会体验土耳其的特别文化、历史、实务、音乐、还有舞岛，而且都是从社会学得角度切入！

会议的主题相当符合这个时代的氛围，而且随后土耳其发生的事件可以更确定这点。在土耳其，所谓的动荡是被一群年轻人想要保护 Istanbul 公园中的一棵数所引起的。这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性的抗议，反对政府对于人民生活的控制，这也让土耳其的社会学家想知道这个运动的启示，看看会给政治参与、民主、自由、媒体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看 Zeynep Baykal、Nezihe Başak Ergin 和 Polat Alpman 这期的文章。）

这个会议让我们看到了美国“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的相似性，更加清楚社会学如何深化理解这些抗议及其对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影响。这个会议也有幸有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而世界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是个有意义且具有挑战性的一次试验，从大变迁中找寻比较的规则，在不同的程度上如何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也希望有更创新的比较架构去理解这个新世界。

这个会议再次证明了社会学诞生于两百年前的社会动荡。那次动荡永远改变了整个世界，为现代社会铺造了一条大道，也不断产生许多冲击和挑

战。各国来的社会学家一起为这个动荡时代思索出路。

我代表这次会议，向各位至上深深的感谢，谢谢你们参与和贡献，ISA 的执行委员会和会议有了你们的支持，可谓欣欣向荣。■

> 社会学家于横滨聚首

by Mari Shiba, Nagoya University and ISA Member of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y of Migration (RC31), Kyoko Tominaga, University of Tokyo, Keisuke Mor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nd Norie Fukui, Kyushu University, 日本



横滨的会前会。世界大会将在2014年7月13-19日举行。

Koichi Hasegawa, Shujiro Yazawa, Yoshimichi Sato, 和 Sawaka Shiriase 教授是下一届世界大会当地筹办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于会议即将开始的前一年举办会前会，用意是把世界的社会学家邀请过来和日本的年轻社会学家对话。这些人包括了：美国的 Margaret Abraham，菲律宾的 Emma Porio，以及韩国的 Han Sang-Jin。以下是他们想对大家说的话：

> Mari Shiba:

我发表过一篇名为 “Mutual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Dialogue with Others within Us: A Case Study of Inter-country

>>

Adopted Childre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的文章，关心文化本质主义在多文化政策下的问题。我的兴趣是“中间者”在多数和少数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形成“共居”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多元文化的共存。作为一位研究生，参与上一届歌德堡世界大会和后来在 Buenos Aires 的论坛，这个经验让我可以说多了一个新的朋友和同事的社会网络。所以我鼓励世界上的年轻朋友们，明年一定要来横滨参加会议，这是一条通往璀璨未来的道路！

> Kyoko Tominaga:

我的文章是“How Activists Connect Their Weak Ties? What is Their 'Sense of Community'? : Anti-G8 protest as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Networks among Activists”。我研究日本的全球正义与反全球化运动。我发现各国虽然都有类似运动，可是策略、内容、组织型态，让这些运动不只是全球性的，也是国家与在地的。会议的发表经验让我知道了日本这类的运动有何优缺点，也针对我的分析架构得到了很多回馈。

> Keisuke Mori:

我很高兴有机会发表“Connecting to the Third World Project: Genealogy of Anti-Military Base Movements in Okinawa Island from a Worldwide Perspective”，我试着把战后日本琉球的历史和世界史连结起

来，比较类似的反军事基地运动。这次经验让我得到许多宝贵建议，让我可以从更全球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 Norie Fukui:

我的题目是“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Post-conflict Northern Ireland Society”这是关于北爱尔兰的壁画，分析邻近的小区之间的爱与仇。虽然是北爱尔兰，但是这让我和许多亚洲的经验产生共鸣，帮助很大。

最后，我们想用 ISA 副会长 Margaret Abraham 的话来总结：“邀请来的教授对于议题的多元相当印象深刻，也非常全球性。我们也乐见日本团队如何在 Buenos Aires 论坛搭起资深与年轻社会学家之间的桥梁。横滨是个美丽的城市，而且居民相当文明友善。日本的好客、料理、寿司真的很特别。真的很期待下一届的世界大会！” ■

> 西班牙语团队

Rosario University in Bogotá,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ISA 会员 (RC21)

Majo 是哥伦比亚 Rosario University 社会系副教授。她来自乌拉圭的 Montevideo，从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取得博士，过去五年都住在哥伦比亚。其兴趣是都市不平等，聚焦在特权、边缘、空间等议题。她特别关心占屋者以其组织，以及恩庇侍从网络。Majo 也关心居住隔离、贫民窟等议题。现在她正从事一项比较拉美各国主观不平等的计划。她从 Michael Burawoy 于 2011 年拜访哥伦比亚时就负责全球对话的翻译了。她开玩笑地说：“你不能拒绝 Michael”。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Sebastián 于 2011 年从 Rosario University 毕业。其兴趣是都市阶级、消费、空间的关联，所以他到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攻读地理学硕士，研究 Bogotá 的居住隔离。他现在也是 Rosario University 的 María José 教授的助教，也是 Dejusticia 的研究助理。（在 Bogotá 的一所人权研究中心）。他从 2011 年开始就加入编辑西班牙语的全球对话团队。



Andrés Castro Araújo

Andrés 现在就讀於 Rosario University 社會系。興趣在經濟社會學(工作、組織、專業)和文化社會學，特別是專家知識。現在聚焦在市場、階級、道德分類。也是從 2011 年就加入團隊。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Kathy 刚从哥伦比亚的 Rosario University 毕业。兴趣是社会运动、性别、以及和阶级与族群的互动。现在是 Bogotá 一个集体行动组织的一员，推动青年的社会动员和行动，并保卫他们免于政府的暴力，特别是在贫穷的地区。她也是在 Cazucá Soacha (一个很贫穷的小区)的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的一员，从事社会问题研究。她规划继续攻读研究所，并且已经在 Rosario University 开始其学业，是个跨领与的社会研究。她也将继续在哥伦比亚的社会介入行动。